



国防大学 2 071 3153 9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17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我在西南的挣扎和被歼灭经过	宋希濂(1)
罗广文在四川编练新军和率领第十五兵	
团起义经过	赵秀崑等(48)
第十六兵团在川西起义前后	傅英道(67)
我在成都外围起义经过	鲁崇义(76)
雅安起义经过	杨学端(80)
李文第五兵团在川西投降纪略	王应尊(85)
胡宗南部逃窜西昌和覆灭实录	李犹龙(90)
西南解放前夕美国参议员诺兰到重庆见	
蒋介石的内幕	宋希濂(135)
重庆、成都解放前夕蒋介石指使的大破坏	
与大屠杀	郭 旭(137)
国民党处理闻一多被刺案凶犯内幕	王凌云(150)
昆明“七·一五”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经过	沈 醉(153)
解放前夕的滇局风云	杨肇璠(161)
美蒋在南京受降前后与日寇的勾结	廖耀湘(193)
我所知道的美国“盟军”与陆军总部	张文杰(199)

蒋介石利用陈纳德航空队参加内战片断	程藩斌(208)
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的内幕真相	陈賡雅(212)
重庆三千万元物资走私案见闻	吕恢祺(219)
我所知道的顾祝同	方 曦(221)

附注

对《我在西南的挣扎和被歼灭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五辑

对《昆明“七·一五”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五辑

对《解放前夕的滇局风云》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五辑

我在西南的挣扎和被歼灭经过

宋希濂

一 蒋介石在重庆的一些动态

1949年7、8月间，鄂西的宜昌、沙市及湖南的长沙、常德等地相继解放，白崇禧率桂系部队退据衡阳、邵阳一带。西安、宝鸡等地，亦于6、7月间解放，胡宗南率部退据秦岭及其以南地区。这时的西南，除川、康、滇、黔四省外，还应包括陕南及鄂西、湘西的一部分。在这个地区内，残存的反动武装力量，包括地方保安团队在内，共计约九十万人。军事指挥的首脑部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设在重庆，长官为张群。下辖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设在汉中，主任为胡宗南；川鄂边区绥靖公署，设在万县，主任为孙震；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设在恩施，主任为宋希濂；贵州绥靖公署，设在贵阳，主任为谷正伦；云南绥靖公署，设在昆明，主任为卢汉；西昌警备司令部，设西昌，司令为贺国光；此外还有直属的罗广文第十五兵团等单位。关于各绥署所辖兵力及分布情况，我所写的《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一文（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已有较详细的叙述，不再重复。这些部队除两三个军（例如第一军、第二军）装备较好，兵员较足，具有相当的战斗力以外，其余都是于1948年下半年和1949年上半年被人民解放军打垮了的残部以及一些新兵和地方团队拼凑编成的，没有什么战斗力。

蒋介石为了保住西南这最后一个反共堡垒，实现其“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以便卷土重来”的迷梦，于8月24日由广州飞抵重庆。

他一下飞机，便发表谈话称：“今日重庆或再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所望我全川同胞，振起抗战精神，为保持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

蒋介石过去每到一地，当地的党政军机关，总要强令一部分群众（主要是学生，其次是一些御用的团体）持旗列队前往欢迎。但是，自从他揭下假面具，发动大规模内战以后，由于西南人民对蒋家王朝的憎恶，连这点强制力也失去了。当蒋介石那天带着蒋经国、黄少谷、陶希圣、谷正纲、俞济时、曹圣芬等由广州飞抵重庆的时候，重庆的国民党市党部和重庆市政府再无法强制青年学生出来欢迎，连平日御用的一些所谓“群众团体”也动员不了，最后只得由重庆的一些帮会的袍哥大爷如石孝先（石青阳的儿子）、田得胜、唐绍武、冯什竹等，出动他们的徒子徒孙去迎接这位出身于青帮的老头子。这批社会的渣滓，人数也是少得可怜的。自上清寺经两路口、七星岗、五四路到林森路，没有欢迎的标语，只有用白布写的什么“拥护蒋总裁戡乱到底”、“欢迎蒋总裁来西南主持军政大计”等几个大字，欢迎的团体署名为“汉流”，在长达约四五公里的马路上，稀稀落落地悬挂着。25日我由恩施飞到重庆时，看到这幅凄凉的情景，感到难过，觉得“太不像话了”，却不知从人心的向背得到启发，这也足以说明我当时的思想是多么顽固！

蒋介石到重庆后，即电召各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员到重庆来见他，并于8月29日（或30日）上午9时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除蒋介石、张群外，有刘文辉、邓锡侯、孙震、王陵基、谷正伦、钱大钧、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何绍周、蒋经国、俞济时、邱渊（西南区补给司令）、程开椿（胡宗南部的补给司令）、刘宗宽（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兼第三处处长）、徐远举（第二处处长）、孙伯先（第三处副处长）、沈策（胡宗南的副参谋长）等人。首由徐远举报告解放军在西北、华南各地的进展情况，同时强调西南地区的安定。继由孙伯先就西南长官公署所辖各部队布防情况和一些在后方整补的部队的情形，作了概要的说明。第三个发言的是胡

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他十分浮夸地说胡宗南部守备秦岭地区有充分把握，并说必要时可向关中进击，收复西安；同时提出了胡部策应兰州出击陇南的军事计划。最后由蒋介石讲话，一开头他想安定大家的心理，说“目前局势已经稳定，形势即将好转”。是怎样的“稳定”，是怎样的“好转”，他却没有说出具体内容，只说：“过去有些人投降共产党，现在这些人都知道上了当，觉醒过来了，今后不会再有叛变投降的事了。”接着蒋介石就强调西南地区的重要性，大意和他飞到重庆后发表的谈话内容差不多。最后，蒋介石说，“有陆海空军的国家，是不会被灭亡的。我们现在还有一百多万陆军，有相当强大的海空军，绝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望大家同心同德，坚定信心，坚持奋斗以争取胜利。”蒋介石讲话后，到11时30分会就散了，总共不到三个小时，既无议案，也无讨论。其实，在当时日暮穷途的局面下，这种会议，不能不只是形式的，也可以说是多余的。

蒋介石多年来对于部下，一贯是制造矛盾和运用矛盾，实行双线以至多线政策进行控驭。除了他自己的势力所不能控制的地区外，凡他所委派的方面负责人，军队自师长以上，行政自厅长以上，他总是要实行他的这一套政策，以防止某些人形成一种实力，尾大不掉，危及他的统治。这种实际的事例是很多的，他对于张群这样一个将近四十年的密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也并不例外。张群这次来到四川后，因为所有在西南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均与他毫无渊源，所以他很希望能兼任四川省主席，并不甘于做一个空头的西南军政长官。我于8月9日到渝见他时，他就曾对我表示说：“蒋先生调王方舟（王陵基号方舟）回四川来当主席，一年多了，王方舟个性倔强，态度生硬，四川人多称之为‘王灵官’，他和各方面都搞得不好，你和宗南的部队的补给，主要靠四川，王方舟能不能担起这个任务来满足前方的需要，我很担心。”由此可以看出张群早有撤换王陵基、由他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之意。蒋介石到渝后，刘文辉、邓锡侯和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等人正式向蒋要求撤换王陵基，并拥

护张群主川,但被蒋介石坚决拒绝。同时,我还听说张群曾向蒋介石建议调换重庆市长杨森,并提出以曾扩情继任,但也未获得蒋介石的同意。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坚决维护王陵基、杨森呢?显然是想利用这些派系之间的矛盾来控制张群,控制四川各派系的军阀。

8月28日(或29日)下午,罗广文(时任第十五兵团司令官)邀约胡宗南、宋希濂、何绍周、刘伯龙、郭汝瑰、陈春霖、向敏思、沈策、赵秀崑等十余人,到他的重庆办事处座谈并叙餐。大家交换了一些关于时局的意见,胡宗南主张由大家联名请求蒋介石长期驻在重庆或成都就近指导,获得一致的赞同,当即推郭汝瑰、赵秀崑(赵为罗广文兵团司令部的参谋长)两人起草信稿,经过讨论修改补充后就通过了。这封信约有七八百字,原文我记不得,只记得大意分为三段。第一段说明解放军渡江后的形势与“中央”保卫华南、西南及台湾等地区的决策;第二段特别强调西南地区的有利地势,人力物力的丰富,巩固并充分利用这个地区的优越条件,使之或为反共复兴的基地;第三段请求蒋介石留驻重庆或成都就近指导军事政治党务,使西南地区全体军民团结一致,奋斗图强,“国家前途,实深利赖”,等语。信缮正后,大家签了名,推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何绍周、刘伯龙五人于第二天下午4时前往山洞陵园见蒋当面递交。

蒋介石看完了这封信,首先对我们发了一大套议论,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几百万党员特别是许多负责干部之“不能努力实行三民主义”,接着便说:“我现在台湾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调训负责干部,由我亲自主持指导,如果局势稳定,将来大家也可轮流前往受训。这个学院能不能办好,关系本党的生死存亡,因此,我要经常住在台湾,而不能长期留在四川。西南方面,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能撑持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就一定会发生变化,到那时,我们就可和台湾方面的力量配合起来进行反攻,以争取最后胜利。”蒋说完后,我们几个人也相继说了一些意见,主要的意思仍然是说明请蒋留住四川的重要性。最后,蒋介石只表示说:“以后我可常来四川,

希望你们把我的意思转达给各军师团长。”约一个多钟头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下面我想谈谈我和蒋介石几次谈话的情况。

我于8月25日上午9时半由恩施乘飞机到了重庆，11时即到山洞陵园去见蒋介石。蒋在他所住的一栋小平屋的走廊上接见了。我向他报告我所指挥的部队自宜昌、沙市撤退后的情况并说明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军队粮食补给困难，致使前线部队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影响士气。蒋嘱我找钱大钧商讨解决办法，随即问我：“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叛变，你事先知道否？”我答：“不知道。”又补充说：“当事情发生后，我立即查问电台和陈明仁兵团的电台是否尚可联络，电台答复说还可以，我就即刻发致陈明仁一电探询真相。第二天得陈明仁复电，申述他脱离中央，投向共军的原因，并希望我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我复电拒绝。以后就再没有联络过了。”蒋连声说：“好！好！”谈到这里，谷正纲进来了，蒋介石因为有事，叫我再约时间面谈。

8月26日下午，蒋介石又把我叫去谈话。他要我把我所指挥的几个军的军长师长姓名、籍贯、军校期别及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向他汇报。我逐一地作了答复，并把他们每个人的性格和指挥能力，也概要地加以说明。蒋介石听了，脸孔上显露着相当满意的表情。接着他说：“我们和共党是势不两立，共产党得势，我们这些人会死无葬身之地的。你要告诉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人人抱定为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而奋斗，牺牲了也是光荣的！”蒋介石这番话，充分透露出他在临近末日之际那种垂死挣扎的绝望心情。

蒋介石这次召集好些将领到重庆来，除开过一次毫无内容的会议和个别接见询问情况外，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好些人都很感到失望，例如罗广文就曾对我说：“这次总裁来，我们以为一定有些新的消息，新的办法，但结果仍然是老一套，这样能长期支持下去吗？”会也开过了，见也见过了，钱大钧通知大家说：“奉总裁指

示，各将领没有事的就可回去了。”我于9月2日飞返恩施的前一天，到山洞去见蒋介石辞别时，他又重复了他那套空洞无物的话。老实说，我当时口虽唯唯，心目中已开始觉得蒋介石这座偶像不过如此而已，对他这套话真有所厌了之感。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所以我于川东军事失利后，便产生了和蒋介石及国防部断绝联系，想率残部退到滇缅边区去的行动，后面我将详细叙述。

二 异想天开的所谓“反攻”

我于9月2日下午飞回恩施后，9日中旬某日（确切的日期我记不清楚了），顾祝同偕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许朗轩、第二厅副厅长某（忘其姓名）及后勤方面的人员等飞到恩施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参加者除顾祝同及同来的几个国防部高级人员外，有我和第十四兵团司令钟彬及本部参谋长、副参谋长，第二、第三、第四处处长，补给司令等。首由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就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报告国民党军及解放军的位置（国防部第二厅对于解放军的行动，并无正确的情报来源，只是根据无线电测向台来判断解放军各军的位置）。继由许朗轩发言，说共军兵力相当分散，是我军反攻的良好时机，国防部决定命华中白崇禧所部向湘潭、长沙一带反攻，命退集到福建及沿海一带岛屿的汤恩伯部反攻福州等地，命胡宗南部自秦岭向陇海路西段进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所指挥的部队，应以主力渡过澧水，向常德、澧县等地攻击，以一部向宜昌附近攻击——这是赋与我的反攻任务。最后顾祝同发言，说明这次反攻对政治和军队士气有重大影响，希望各部队长切实执行国防部的计划。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反攻的力量呢？所以我在会议上一言未发。我部的一些幕僚人员提出了关于派空军配合作战及补给等问题，并未获得具体解决办法。会议历时两个多小时结束。

午饭后，我请顾祝同到我的卧室里休息，顺便问他广州方面的情形。顾说白崇禧、薛岳等和他捣乱捣得厉害，对于军队部署等问

题，牵制掣肘，事情很难顺手；解放军主力现在江西，似有越过大庾岭进攻广州的企图，形势殊难乐观，只希望西南方面能多撑持一个时期。约在午后4点多钟，顾祝同等一行离开恩施飞往重庆去了。

顾祝同走后，我立即召集部下开会，一致认为部队在宜沙一带被解放军击破，退到鄂西一带山地，尚立足未稳，加以有些队伍残破不堪，收容整顿也需要一个时期；而补给又是这样困难，实不具备进行反攻的条件。经反复研讨，决定令飭第十四兵团所属之第十五军派一个团的兵力向慈利作试探性的攻击，第一二二军派若干小部队渡过澧水，从事袭击扰乱；令飭第二十兵团（兵团司令为陈克非）派出约两个团的兵力，从巴东、野三关地区向当面的解放军作试探性的攻击；其余各部队应积极整顿补充，并构筑工事。以后这些担任行动的部队，由于受到解放军有力的回击，未获得任何成果，面渡过澧水窜扰的小部队，多半被解放军所消灭了。

至于汤恩伯、胡宗南两部所谓反攻的情况是：福建方面，解放军已肃清福建大部分地区的蒋军，迫近在福建大陆上的最后一个据点厦门，汤恩伯本人逃到台湾去了，其残部逃窜到沿海岛屿。胡宗南派了一部分队伍偷袭宝鸡，不仅没有成功，反面被解放军乘机突破了秦岭防线，打开了通向汉中的门户，迫使胡宗南的部队不断向川北地区龟缩。

据顾祝同告诉我，这次反攻方案，是白崇禧提出来的，而且他主张最力。当时白崇禧退据在湘南的衡阳、宝庆一带，拥有第七军、第四十八军、第四十六军、第五十六军、第一二六军共五个军的桂系部队，其中第七军是桂系军阀北伐时期的老底子，第四十八军则为1932年编成，曾由白崇禧亲任军长。这两个军的军官百分之九十是广西人，兵员亦以广西人为多，战斗力较强，白崇禧并利用封建关系维持其绝对的统治，是桂系军阀部队的两张王牌。除上述五个军外，还有黄杰的第一兵团所属的第十四军及七十一军。8月间解放军四野部队曾有一小部进抵湘乡县属之永丰镇附近，已渐接近宝庆。白崇禧调集数倍的兵力，向这部分解放军攻击，解放军自

动撤退。白乃大肆宣传,说什么“永丰大捷”,极力夸耀桂系军阀部队的战斗能力,认为共产党的军队打不过他的广西部队,因此在那样微妙的形势下,大唱其反攻的论调。但是这位自命不凡、专好玩弄权术的军阀,他的所谓反攻尚未有具体行动之前,解放军就以神速勇猛的行动,向盘踞在衡(衡阳)宝(宝庆)地区的桂系部队进行扫荡,在数百里的疾追中,经四昼夜的激战,将桂系的所谓王牌部队——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的主力,聚歼于衡阳西南的山区。白崇禧经此沉重打击,吓得惊魂落魄,自己乘飞机逃到海南岛,叫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率桂系部队及黄杰所部第一兵团、刘嘉树所部的十七兵团和余汉谋部的残余部队,东出粤桂边境,企图打通雷州半岛的出路,以实现他的所谓“确保左右江,屏蔽昆明,支援海南,以争取外援”的方案。但是解放军的英勇堵击和风驰电掣、连续不停的猛追下,所有桂系部队及黄杰、刘嘉树等部,一举被聚歼于粤桂边区的国境线上,除黄杰兵团的残部六七千人窜入越南,刘嘉树兵团约五千人逃往云南外,几无一漏网。

当时残存在西南的蒋军,大多残破不堪,或者由一些地方团队和新兵临时编成,加上一些地方军阀的部队,都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而且散布在北起秦岭、南至昆明的广阔地区里,是不可能在任何地点打一次像样子的仗的。人民解放军无论向那一点进攻,都可迅速击破,是毫无问题的;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国民党军队到西藏或国外去。当时蒋军胡宗南部三十多万人驻在陕南、川北一带,孙震、宋希濂两部共约二十万人驻在鄂西、川东一带,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是以保卫四川为核心的。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首先以二野的杨勇兵团击破蒋军在湘西芷江地区的微弱抵抗后,迅即进入贵州,于11月中旬解放贵州省会贵阳,除一部扫荡贵州境内残敌外,主力西出毕节进入川南,相继解放泸州、宜宾、乐山、自贡等地,并进出于成都以西之邛崃、大邑一带,截断蒋军入西康逃路。与此同时,又以二野的陈赓兵团自广西沿着桂越、滇越边境进军,直抵滇缅边境的芒市、龙陵、腾冲等地,形成更

大的一层包围圈。由贺龙元帅指挥的周士第兵团，由刘伯承元帅指挥的二野的陈锡联兵团及四野的一部，也同时分别在陕南、川东击破胡宗南、宋希濂、孙震等部。在川境内的蒋军，最后猬集于成都盆地，被解放军层层包围，全部歼灭。有少数残余逃到西昌、滇西一带，最后亦被彻底消灭得干干净净。

三 荆门战役前我的部署和策划

1. 指挥机构名称、地点的演变

1948年8月，国防部发表我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9月中旬我到沙市成立第十四兵团司令部，10月间将兵团司令部推进至荆门。到11月初，因淮海战役的序幕战揭开，蒋介石将我所指挥的二十军、二十八军东调，情势急变，我的兵团司令部于11月底又开回沙市。1949年2月解放军攻占荆门，有一部数千人自当阳进攻宜昌的模样，原驻宜昌的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惊惶失措，立即率其公署人员乘船撤往巴东及三斗坪等地。我闻此消息，即命第二军及第十五军分两路自沙市西北地区向当阳前进，我自己亦乘军舰到了宜昌。局势稳定后，我派员到三斗坪请孙震回来，但孙不肯来，并乘船上驶，撤往万县。国防部乃于3月间发表我为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划湘西鄂西地区归我负责。于是，我乃将司令部移驻宜昌，并将十四兵团司令官一职交由钟彬接替，仍归我指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所载张治中先生《北平和谈前的几个片断》一文中说：“譬如宋希濂要逼走孙德操（即孙震），自己移驻到宜昌去，便说是奉了他（指蒋介石）的电报，以后孙到重庆便很愤慨地告诉萧毅肃，由萧传了出来……”。孙震当时离开宜昌的经过事实，确是如此。孙震那时最感苦恼的是，名为绥靖主任，实际上却是一个无兵司令，我的兵团在他的绥靖区内活动，但国防部并未叫我归他指挥，这样，当我到宜昌后，他自然不愿回来了。此事是当时的军事形势造成的，并不是我有意识地要逼走他

的，蒋介石也没有给过我电报。1949年7月中旬解放军向宜沙进军，并已在沙市下游渡过长江，我乃下令放弃宜沙，向巴东、五峰、石门、慈利、大庸之线转移；8月初司令部移到鄂西的恩施。8月中旬，国防部发表我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直到12月底解放时为止。

2. 指挥部队的演变

1948年9月我在沙市组成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后，国防部及华中“剿总”先后命令拨归我指挥的部队计有：陈克非的第二军，刘平的第十五军，杨干才的第二十军，刘秉哲的第二十八军，李振的第六十五军，方靖的第七十九军，张际泰的湖南保安第一旅。到11月，第二十军、第二十八军调往淮海战场，第六十五军原驻陕西宝鸡一带，由于胡宗南坚持不放，始终没有过来。这样，就只剩下三个军及一个旅了，而第十五军全系由南阳地方团队组成的，装备和训练都很差。我为了扩张势力，于1948年12月至1949年9月间，先后向国防部建议编组了两个军（每军两师，共四个师），即：以原湖南省保安第一旅改编为一个师，番号为二九八师，仍以张际泰任师长；以鄂西师管区的两个新兵团为基干扩编成为一个师，番号为五十四师，派董惠任师长；以上述两个师编为一个军，由原任湖北省保安副司令陈希平担任军长，番号为——八军，驻恩施、建始一带。1948年11月国防部授权给我成立一个师，番号为二一七师，派谢淑周任师长，在湖南省军管区接收一批新兵并自行募集一些编成；原驻南阳第十三绥靖区司令王凌云自南阳南撤时，带来南阳附近地方武装褚怀理等三个纵队共八九千人，纪律极坏，在松滋一带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我派部队将这三个纵队解散，调换大批干部，改编为一个师，番号为三四五师，派黄鼎勋为师长。有了这两个师后，我又向国防部建议编为一个军，番号为一二二军，由张绍勋担任军长，驻在湖南的石门、慈利一带整训。原驻在宜昌的六十师，本是归川鄂边区绥署孙震指挥的，但该师师长易瑾是我多年的部属，所以

和我常有联系。另外还有一个师，番号为二二三师，师长为陈瑞鼎，驻在秭归以北一带担任警戒。白崇禧那时和我的矛盾日益尖锐，他想抓住这两个师来牵制我，乃向国防部建议将这两个师编成一个军，并保荐他总部的副参谋长赵援为军长，番号为一二四军。3月间我到宜昌后，国防部命令这个军归我指挥。至此，归我指挥的部队，就有第二、第十五、第七十九、第一一八、第一二二、第一二四共六个军的番号了。钟彬原在广州任第四编练司令，国防部发表他为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后，他于4月间来到宜昌，我将十五军、七十九军、一二二军编为第十四兵团，并指定该兵团司令部驻在宜都。及到8月间部队自宜沙一带转移到巴东、野三关、五峰、石门、大庸之线后，9月初我又得国防部同意，将第二军和一二四军组成为一个兵团，以第二军军长陈克非兼任兵团司令官，番号为第二十兵团。另外我又于1949年4、5月间大力收编湘西地方武力。此种地方武力大都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平日作威作福，欺压人民。这些恶霸势力知道共产党一来，将无他们存在的余地，因此深感危惧，纷纷派人或亲自来宜昌和我接洽，要求给予名义，并酌量补充弹药，主食由地方筹给，副食请中央补助。我知道这些人不可靠，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我想利用这些力量，使他们在解放军向我进攻时能起一些扰乱和牵制的作用。于是我答应收编，条件只有一个：凡受收编的，必须开到我所指定的地点集合，经我派人点验人数武器后，才能发给副食费，并酌量补充弹药。大体商定后，经我先后收编的，计有：田载龙的新编第一师，周燮卿的新编第二师，陈子贤的新编第三师，罗文才的新编第四师，汪援华的新编第五师，陈策勋的新编独立第一旅。其后又给辰溪张玉琳匪部以暂编第二军的名义。并于6月初召集他们及湘西的一部分县长到常德开会，会商他们的驻地、补给及整编等问题，我在会上号召他们一致团结起来对付共军的进攻，不要再自相残杀，否则将同归于尽。

我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要积极扩编部队，扩张势力呢？除了认为要对付解放军的进攻，必须有力量这个主导思想外，还有一种思想

也占相当重要地位,所以我想附带谈谈。自北伐至抗日战争的初期,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人事上的升迁调补,基本上还是相当平衡的,即是说,除了极其个别的外,所有升调起来的人,一般都是基于他的战功和在部队有相当时期的作战和带兵经验。及到抗日战争中期,这种平衡就打破了。蒋介石师心自用,他害怕这些日益扩展起来的嫡系力量,有些人兵权过大,会对他不忠诚,于是他就开始把兵权寄托在他认为对他最忠诚可靠的几个浙江人身上,这就是陈诚和胡宗南,其次是汤恩伯。不到几年功夫,陈诚以第十八军的第十一、第十四两个师为基干发展到几十师,胡宗南以第一军的第一、第七十八两个师为基干发展到几十个师,汤恩伯以第四、第八十九两个师为基干,也有相当扩充。同时,在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种论调,说是只有作战经验而没有很好的战术修养的指挥官,是不能对付日本军队的,这样,凡属是到过所谓陆军大学镀过金的人就很吃香,晋升很快。这些人有的原只是上尉或少校级,在陆大经过三年的书本知识的学习,一毕业出来,就一跃而为少将的,比比皆是。这样一来,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不平 and 怨愤一天一天地增长。1943年关麟征在昆明和陈诚大吵大闹,气得陈胃疾突发,吐出一脸盆鲜血,形成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之间的斗争的高潮。这件事主要就是因为人事迁调问题而闹起来的。由于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人大权在握,他们的部队的干部升迁很快,而其他部队的干部升调的机会较少或较缓,就必然影响到部队的意志和士气。尤以1946年陈诚以国防部参谋总长的身份,几乎掌握着军队的全权,他借整编为名,尽量排除异己,这对于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内部意志涣散,士气低沉,是有重要关系的。

我对于蒋介石宠信浙江人把持一切(包括军事、政治、党务、财经、特务等)的作风,也早怀不满,因此想抓住这个机会,造成自己的势力。1948年12月我到南京,曾对林蔚文(参谋次长)、毛景彪(第一厅厅长,主管人事,两人都是浙江人,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郑重表示说:“要想使军队发挥力量,内部的团结和意志的统一,是

十分重要的。如果一个团长或师长，他自以为另有靠山，在军队里对上级不服从或阳奉阴违，这怎能把仗打好呢？我希望国防部今后对人事不要控制得太严。我们所保举的人，都是总统的学生，都是在军队里出生入死干过多年的人，希望对他们寄以信任。“经过这次交涉，加以在那样危难的关头，他们想要控制也就控制不了了。因此，我所扩充的部队的军师团长，几乎全是我所保荐，这些人大多和我共事过多年，我了解他们，他们也了解我，在指挥上就比较便利些。

3. 我和白崇禧的矛盾和斗争

淮海战役开始后，白崇禧曾一度劝诱我和他一致倒蒋（详见我所写的《淮海战争期间蒋介石和白崇禧的倾轧》一文），因为我没有答应，他对我自然是感到十分恼火的。他对于我的重回鄂西，极感不快，多方设法打击我，最突出的表现在下列三个问题上：

第一，当3月间我指挥第二、第十五两军向宜昌前进时，他闻之极为震怒，立即亲自打电话给我，询问我为什么派兵去宜昌。我说：“根据宜昌六十师师长易瑾的电报，当阳共军有六七千人正向宜昌前进，孙震已率其公署人员退往三斗坪、巴东等地，并下令要他破坏宜昌电灯厂，商民环请不要破坏。他问我应如何应付，我已复电叫他沉着固守，立即派兵来援，电灯厂不要破坏。宜昌是川东的门户，是鄂西部队粮弹补给的基地，宜昌若失，对本兵团影响甚大，所以我派兵前往支援。”白崇禧说：“襄阳、荆门一带，尚无共军大部队集结情形，依情况判断，当阳的共军只不过是一些土八路，顶多两三千人，不会有六七千人，六十师一个师在宜昌，足够应付，你不必派兵前往。”我说：“我希望总司令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万一宜昌竟为共军所占，一方面迅速渡江截断我兵团的退路，一方面使四川运来的粮被阻断，这样，问题是很严重的。”白说：“一切我负责任，你照我的指示，不必派兵前往。”我说：“我们研究一下。”这次通话，是那天下午6时左右（日期我记不确切），我深知白崇禧要阻止

我去宜昌的企图，经过再度思考后，决定不听他那一套，命令部队分两路星夜向宜昌前进，同时叫第二军第九师留下一个战斗力较强的团，随我同行。这天晚上，一直到深夜2时，白崇禧亲自打来三次电话，我都不接，叫副参谋长罗开甲和他周旋。白问我到哪里去了，罗开甲告诉他，说我已随部队出发。白听了暴跳如雷，大声对罗开甲说，“我叫宋司令官不要派兵去宜昌，为什么不听话呢？”罗低声下气地向他解释，他仍然很生气，叫罗开甲派汽车去追我，并命令部队开回来，罗唯唯。其实这晚我并没有走。到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叫第九师那个团登上一艘兵舰和另一只火轮，装载完毕后，我和第二军军长陈克非坐上兵舰上驶。路过枝江，我们上岸去看王凌云^①。不料他竟误以为我们是去抓他的，听说我们来，便从司令部后门溜走了，一直溜到重庆。我们到处找他找不着，只得怅然上船西行，于当日傍晚到达宜昌。

六十师官兵闻我们到来，十分兴奋，隔了两天，由沙市和十里铺分别向宜昌进军的部队，大部分抵达宜昌外围。原来在当阳的解放军，兵力并不大，闻我军向当阳、宜昌前进，他们便撤往远安去了。我到宜昌后，即派人往三斗坪欢迎孙震回来，他不肯来，我便将经过详细情形电报国防部，不久，国防部发表我为“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并指定司令部驻宜昌，另命孙震的司令部改设在万县。

白崇禧极力阻止我的部队开往宜昌，是有他的打算的。自1月21日蒋去李代后，桂系的主要企图，是希望至少能保有两广及西南地盘，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援下，来和共产党抗衡。桂系早就派了代表到四川、云南等地积极活动，拉拢地方军阀势力。而白崇禧迫不及待地向国防部提出以六十师、二二三师合编为一个军，并要他的心腹赵援担任军长，即为他整个阴谋的一着棋。因赵为四川人，

^① 王凌云是第十三绥靖区司令官，他率部由南阳南撤后归我指挥，到江陵、沙市时，我和他商定将能作战的部队第二、第十五两军留在江北，不能担任战斗的部队，移驻江南，由他负责整训。他满口同意，其实他思想上认为我剥夺了他的指挥权，满腹猜疑和不满。